

内部交流

研究与参考

2017年第2期（总第66期）

“习特会”评估与中美关系展望研讨会会议纪要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SHANGHAI INSTITUTE OF AMERICAN STUDIES

“习特会”评估与中美关系展望 研讨会会议纪要

时间:2017年04月08日下午14:30—16:30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协办单位:《文汇报》《新民晚报》

地点: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一楼旭阳厅

吴心伯(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
“习特会”如期举行,顺利结束。这是今年中国外交的一个成功开局。今天我们对“习特会”进行及时的评估,按照会议的安排,有五位专家做专题发言,每位十分钟。然后是讨论和评论阶段,最后进行总结。

夏立平(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各位领导、老师、专家下午好!这次“习特会”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一次双边外交行动,而且是党的十九大之前中国最重要的首脑外交。这次首脑外交对确定我们今后的国内政策和外交战略都具有重大的影响,对中美关系和世界形势都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在这次“习特会”上,习主席有效克服了客场会谈的不利态势。这次“习特会”的成果超出了我们的预期,为中美关系在新起点上取得新发

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中美关系“大厦”的构建规划了新的蓝图。如果说,1972年尼克松访华是改变世界历史的一周,也许将来回顾这场“习特会”的时候,也会将这两天称为改变世界的两天。

我们可以从八个方面来分析这次“习特会”。

第一,双方就保持中美关系良性发展达成共识。这次首脑会晤的成果有虚有实。对中方来讲,最关键的是要通过面对面的会谈,为今后至少四五十年中美关系发展确定方向,这次会晤的目的可以说是达到了。习主席讲得很清楚,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特朗普也表示,美中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可以共同办成一些大事。特朗普也愉快地接受了访华邀请,并且希望尽快成行。

第二,建立和启动双方团队的四大机制。这四大机制实际上是把过去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分成四个方面,即外交安全对话、全面经济对话、执法与网络对话、社会和人文对话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在美国国务院的新闻稿中将其称之为四个“支柱”。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汪洋副总理与美国的商务部部长实际已经启动了中美全面经济对话机制。

第三,加快发展中美经贸和投资关系。中美经贸关系是此次会晤的一个重点,特别是特朗普想要抓住这次机会,向中方施加压力,争取减少中美贸易的逆差,在加大中国对美投资方面要取得进展。此次会晤在中美经贸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进展。美国商务部制定了一个“百日计划”。这是一个加速计划,而且在这百日之内双方要经历多层级的评估。对中方来讲,在对美投资、增加美国就业人口等方面都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第四,共同推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的妥善处理和解决。朝核问题是美方重中之重,这方面双方也取得了进展。双方表达了朝鲜半岛无核化承诺以及同意加强合作的承诺。虽然这次并没有达成具体的协议,但应该讲,中方对美方认为朝核问题已经达到非常严重阶段的观点是同意的。我们看到中央军委参谋长也参与此次会谈,这在过去的习奥会时是没有的。房峰辉

参加此次会谈,既是中美军事交流,也是外交安全机制的一部分,我想这肯定也与朝核问题有关。4月6日特朗普发令对叙利亚进行导弹攻击,我想这与朝核问题没有多大关系。特朗普对叙利亚发动导弹攻击,主要是从美国国内政治出发,进一步撇清他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为美国国内正在调查特朗普这方面的问题。

第五,继续加强两军的军事安全互信。奥巴马执政期间,中美两军军事互信关系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而且军事安全互信是中美战略互信的基础。这次实际上对中美安全互信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一些安排,包括保持两军各级别交往,继续发挥亚太安全对话磋商机制的作用,建立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新平台,商定了年度交流合作项目,不断完善两大相互信任措施的机制、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等。

第六,建立两国领导人良好的个人关系和工作关系。这次会晤实际上是习近平和特朗普这两位性格迥异的大国领袖第一次会面。总体来看,这次会面还是比较愉快的。特朗普称和习近平结下了“出众的友谊”。习近平也说通过这次会谈有了深入的长时间沟通,达成许多共识,最重要就是加深友谊,建立信任。

第七,发挥中国软实力的作用。这次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软实力,特别是中国文化在这次中美首脑会谈中间也发挥了很积极的作用。习主席和夫人彭丽媛到海湖庄园后,特朗普外孙女和外孙演唱了“茉莉花”并背诵《三字经》和唐诗,彭丽媛和美国第一夫人参观棕榈滩的一个学校。彭丽媛也是中国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朗普称赞彭丽媛的时候连说三个“great”。

第八,特朗普班子中对华理性派的影响力增强。经过特朗普上台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国务卿蒂勒森、特朗普女儿伊万卡和库什纳是对华班子中的理性派、温和派。他们为安排这次“习特会”并对“习特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有利于双方工作班子的沟通和协调。

何建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我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构建中美友好大厦,关键在两国元首间共识磨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习特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成功举行。中美元首先后进行了两场正式会晤,就中美双边重要领域务实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深入交换意见。两国元首双方高度评价中美关系取得历史性进展,认为这次两国元首会晤是积极和富有成果的。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各国人民。

“习特会”吸引世界瞩目聚焦,国际舆论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场有全球影响的相亲会”、“世纪性会晤”、“一场关键棋局”。“习特会”为什么全球关注度如此之高?道理很简单,因为隔洋相望的中国和美国是当今世界两个伟大国家:中国是具有 5000 年历史传承的文明古国,美国是开国 240 年的近现代国家;美国是发达的世界大国,中国是快速崛起的发展中大国;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两国在全球所占体量份额大,一举一动具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穿越时光隧道,回望历史进程,中美两国 200 多年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交流交往一路走来,恩怨情仇、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自 45 年前尼克松“破冰之旅”结束对抗,中美开始向关系正常化方向发展,和平合作关系来之不易。

美国第 45 届总统特朗普入住白宫,给美国乃至世界带来不可测的历史变动性,也给中美关系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一度令中美友好人士忧虑也令世界不安。在世界关注的目光中,中美两国元首在热情、友好、亲切的氛围中举行了会晤,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沟通,加深彼此了解,增进相互信任,达成许多重要共识,建立起良好工作关系。这次“习特会”的成功举行,无疑向世界释放了中美关系向上向好发展的积极善意,传递了中美合作惠及两国人民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的确定性前景。

“习特会”取得预期的丰硕成果,具体可从以下方面加以理解:

一是定位中美两国关系。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关系取得历史性进展,认为两国作为世界大国责任重大,两国关系好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对世界也有利。正像习近平主席表述的那样,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

二是明确领袖历史担当。中美关系今后如何发展?需要两国领导人深思并作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习近平主席表示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在新起点上推动中美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特朗普应邀年内访华,双方同意共同努力,扩大互利合作领域,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管控分歧。这次两国元首通过会晤建立起良好工作关系,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

三是清晰合作正确选择。合作是中美两国唯一正确的选择,两国完全能够成为很好的合作伙伴。下阶段双方要规划安排好两国高层交往,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拓展贸易投资、外交安全、执法网络、人文交流等广泛领域务实合作,以建设性方式处理分歧和敏感问题,让两国人民从中美关系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

四是规划沟通协调路径。双方要加强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和协调,共同推动有关地区热点问题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拓展在防扩散、打击跨国犯罪等全球性挑战上的合作,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和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五是展望未来发展前景。习近平向特朗普介绍了中国的发展理念,强调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不奉行你输我赢理念,不走国强必霸老路,愿同美方一道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习近平将中美关系比喻成“大厦”,万丈高楼平地起,愿同总统先生一道,带领两国对发展中美关系抱有良好愿望和热情的建设者,把中美关系的“大厦”一层一层建设好,使之更牢、更高、更美。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美关系,学界梳理分析很多,简言之一条大致脉络为:二战期间,中美是盟国,美援对中国取得抗战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新

中国成立后的五六十年代,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中国实行军事敌对、经济封锁、政治孤立政策;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迅速恢复外交关系,联手抗衡苏联势力扩张;冷战结束后,美国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将中国作为潜在对手,两国关系一度陷入低谷;美国“911事件”后加强与中国合作,应对国际恐怖主义;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中美爆发汇率以及原油、黄金等大宗商品期货战,利益之争升级。

中美关系现在又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节点上,“习特会”为中美关系发展无疑带来了美好预期。制衡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可以说集中在这五个选项上:一是和即和平,和则共安;二是合即合作,合则互利;三是斗即斗争,斗则两伤;四是破即破裂,破则相害;五是友即友好,友则双赢。这次“习特会”的积极成果,是在诸多选项中确定性地指明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为和平、合作、友好。当然,中美关系不可能没有竞争甚至必要的斗争,但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型大国关系,还是应当“斗而不破、和而不同”,促进中美关系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

当今世界局势错综复杂,人类社会治理面对许多复杂命题,比如经济全球化与逆全球化思潮、贸易自由与保护主义、世界和平与恐怖主义、精英治理与民粹主义、科技进步与文化冲突、经济发展与贫富差距等等。这些全球治理的严峻挑战,需要国家领导人之间达成共识,齐心协力带领世界人民加以应对。因为在互联互通的“地球村”里,国家乃至世界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领导人的领导力,国家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跟国与国之间关系密切相连,归根到底代表的是国家关系,国家利益是最优先目标。从某种特定意义上看问题,大国领导人之间互信良好的个人关系,对改善优化全球治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无疑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这次“习特会”的成功举行,在世界各国和人民面前展示了大国领导人之间会晤交流、沟通协调、达成共识、建立互信的良好效果。这表明,面对世界不确定性叠加风险,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共识磨合具有非常重要意义。“习

特会”的积极成果,并将对未来构建中美友好大厦发挥推动作用,也必将会给世界格局、全球治理、人类发展提供正能量。

刘鸣(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常务副所长、研究员):

除了我们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以外,美国国务卿、商务部部长和财政部部长在记者招待会上也释放出了一些信息。

第一,会谈比预期的成功。预期中有很多的担心,对美方来讲,因为很多官员还没有到位,所以他们认为这次会谈是匆匆忙忙的,没有准备充分,而中方是精心准备的。这次会谈美方的智库没有发挥作用,但现任美方官员,特别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这次会晤我们在工作层面做了很多努力。该谈的东西实际上都谈到了。

第二,特朗普表现中规中矩。原先我们有很多担心,比如特朗普可能有很多不礼貌的举止或者是讲很多大话,又或者是讲一些羞辱性的语言,但最后都没有。对特朗普而言,有这样的表现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他三点钟到会晤地点,习主席是五点钟到的,特朗普在门口迎接,握手也不像接待安倍时那样,在姿态方面都还是表现得很尊重的。

第三,主要官员都到场。过去习主席出访,一般防长不随同参加,这次中美两国防长都参加了。此外,我们的副总理汪洋以及美方的新任商务部长、财政部长也都到位了。

第四,对话机制得以保留。我们原来一直担心六月份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能否举行。如果不能举行,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颠覆性的影响。这次美方用了一个词:Break-out,即把原来的战略与经济对话“打碎”了,打碎成四个“支柱”。新机制把执法网络纳入其中,人文对话机制也得以保留。前几年很多人议论,原先的对话机制太过庞杂和花哨,效果不是很好。这次“打碎”了以后,既延续了原先的机制,也尝试做出了改变。如果没有改变,特朗普也不会接受。

第五,对打击叙利亚的反应。会谈期间正好碰到了美国打击叙利亚,记者招待会上有人就此问题向习主席提问,习主席表示感谢美方通报了这种情况,但并未表态是否支持美国打叙利亚。从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看,我们基本的态度与俄罗斯还是有一些不同,但我们也强调了反对生化武器。美方认为这件事肯定是叙利亚空军干的,于是把他们 20%的空军干掉了。

第六,朝核问题仍待观察。按照我们现在的想法,先要控制当前的局面,不能让局势进一步恶化。朝鲜方面虽然说会“先发制人”,但是如果美国真的有动作,朝鲜会很着急,因为它毕竟是弱势。这次记者会上蒂勒森讲得很清楚,中美双方都认为无核化是前提。蒂勒森说“不一定要有非和平的行动”,这个话是反过来讲的。实际上中美双方的立场是不一样的,中国反对使用非和平手段,但美国仍保留了这个选项。美国同意中国采取一些行动,但又有所保留,如果中国无法与美国协调,美国也会行动。总体上看,我认为在朝鲜问题上,美国希望中国进一步发挥作用,但给予中国多大空间还有待观察。原先是先往会谈方面靠,需要美国方面做某些让步,但这次并未明确提出要朝鲜怎么做。我认为美国会先让中国采取一些行动,给我们一些空间。

第七,经贸问题取得进展。这次会谈中,美方财政部长和商务部长都认为,在两天的有限时间里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双方设立了机制,确立了“百日计划”。当然,一百天也很难解决这些问题,但双方都表达了一个诚意,中国这次也明确说贸易不平衡对中国也是一个问题。双方在这些方面都会做出共同努力。这是一个好的开端,但会有很多更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这次会谈的重点在经贸层面,中美之间都是有备而来。美国方面,直接向习主席提出四大关切,即产业政策、农业、技术和网络。在这四大关切中,

前三个都和经济有关,但美方没有直接提及贸易,贸易问题只是产业政策和农业技术问题的一个表现。产业政策主要涉及汽车和钢铁行业等,美方始终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是保护型的,这是导致中美贸易双边失衡的重要原因所在。农业政策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技术层面主要是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它导致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还不够放开。产业政策上中国过分保护和封闭的政策不利于美国的对华投资,这也是美国的关切。

中国提出了四大方案以应对上述四大关切。但是总体而言尚不完全匹配。

第一,双边投资。中国要求美国继续推进中美双边自贸协定谈判(BIT)。

第二,双向贸易。通过双向贸易大项目方案的制定扭转中美贸易的失衡。

第三,能源合作。能源是中美能够进行务实合作的新增利益来源。中方在这方面有充分的准备,但没有提出具体的方案,因为中方发现美方在“习特会”时完全被叙利亚的突发事件分心了。

第四,基础设施建设。中国在基建方面也准备了数千亿美元的方案。我相信在全面经济对话中,双方已经谈到了这点。有报道说中国的计划非常雄心勃勃,能够为美国创造 70 万人的就业。政府层面肯定有精心的计算,但这 70 万就业和马云所说的 100 万就业完全没有关系。

在两天的会面中,这四大措施没有完全展现,双方都留有后手,即“百日计划”。“百日计划”既有合作清单,也会有早期收获。“百日计划”如何创造出更多的红利和合作机会将是一个艰难的磨合过程。随着美方相关官员的到位,双方围绕“百日计划”的设计和对接会更多,当然摩擦也会更多。此外,如 4 月美国将发布的汇率报告,以及在对如钢铁等特定产品征收反倾销税上,都会引发中美斗而不破的摩擦。在“百日计划”里我们还要继续跟踪,

从现在双方所展现出来的这些内容来看,还看不到太多具体的方案。

金永明(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海洋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我主要讲两点。

第一,访问的成果与性质。

一是定性。此次两国首脑峰会既不是国事访问,也不是工作访问,而是一个增进个人相互理解、共同阐释关切、得到相互尊重、达成更多共识、面向未来共同发展中美关系的一次会晤。

二是定位。中美两国在当今情势下的定位,应该是发挥中美两国更大的作用,特别是中美两国之间发挥两国各自的作用。

三是定方向。主要是规划面向未来的中美关系发展。

四是定路线图。如四个对话机制的建设。这是对原有机制的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五是定目标,定成果。双方要有早期收获,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特别是已经进行的两个对话,全面经济对话和安全对话,双方都希望得到更多的成果,为中美两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

第二,中美对国际规则的认知差异。

尽管中国外交部的新闻稿中未谈及此内容,但如何看待国际规则以及军事化的问题仍是双方需要讨论的重点。

白宫的新闻稿中提到中美双方就区域和海事安全问题进行了坦诚的对话。特朗普总统也提出对在东海和南海坚持、遵守国际规则和规范重要性的关切,以及对军事化问题的担忧。

中美两国是否对国际规则有共同的认知,将对两国关系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有两份重要的国际文件需要关注:一是《联合国宪章》。从联合国宪章的角度来看,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禁止使用武力,已经成为必须严格遵守的国际法。如果国家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和分歧,应该通过协商、对话、谈判

的方式解决。比如朝鲜核问题、叙利亚问题,应该特别发挥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二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公约就海事安全问题有共同的规则,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认知差异,两国对军事化问题也有不同的认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88条规定,海洋必须用于和平目的。所谓和平目的就是对于海洋资源的开发利用、航行自由等方面。但对于军事活动,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以目标为导向,这些活动往往到最后才知道是否有军事目的或者非航行目的。中美两国对于军事活动和航行自由的认识都有分歧。中美两国的分歧在于,航行自由是否需要经过海域管辖国家的同意或是否需要通知沿海国家。中美两国如何通过双边和多边机制,在共同规则,特别是航行自由规则达成共识,甚至制定新的规则,都应该是双方努力的方向。

这些问题应该在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或者执法安全对话中,通过协商、对话、谈判的方式进行沟通。特别是中国要提出,欢迎美国加入到“一带一路”的框架中,通过国际组织或者双边机制建设,就共同存在的国际规则以及军事化问题等,以对话协商的方式达成共识。甚至可以在对话协商的基础上,发展出指导其他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关于自由航行方面的软法。

王联合(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此次“习特会”的主要目的是为两国领导人提供机会,促进彼此了解,建立良好工作关系,并完善中美对话机制。会晤前双方都通过不同形式,尽量降低外界对“习特会”的预期。这样的安排也符合双方对此次首脑会晤本身的定位。但即便如此,这个会晤也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实现首脑会晤,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有助于为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构建一个战略基础。从会晤前后发表的新闻稿来看,两国通过首脑会都有所收获。特朗普称与习主席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也取得了巨大进展。由他和习主席本人构建的中美关系是杰出的,他也期待和习主席有更多的接触。在习主席看来,首脑峰会为中美关系在新时期、新起点上指

明了发展方向。

经贸问题方面,特朗普在3月30日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涉及贸易活动和贸易赤字问题,加大了美国征收反倾销税。预计该行政命令将给中国对美出口带来巨大的影响。从美方的信息看,此次会晤的主要目的是为双方贸易和投资的讨论搭建一个框架,但两国领导人是否已就具体问题进行了讨论和解决还有待观察。

朝核问题方面,4月2日特朗普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专访时就朝核问题指出,如果中国不愿意对朝鲜核威胁采取措施,美国将单方面行动。由于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对话,仍然无法解决此问题,现在时间耗尽,美国已把所有的选项包括军事打击都摆在桌面上。美方把对朝施压的责任推给中方。作为回应,中美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共同努力,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中方可能会加大力度,履行联合国制裁的决议,甚至不排除对为朝鲜提供重要金融支持的中资银行业务进行调整和重组。

台湾问题方面，“习特会”未公开谈及台湾问题。自特朗普当选以来,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逐渐凸显出来。它不仅是一个问题,而且被美方作为设置其他问题的背景和敲打中国的筹码。习主席必然会向特朗普提出对台湾问题的关切,要求特朗普重申遵守“一中原则”。我们预计美国的回应可能是继续宣示他们的立场而不采用中国的原则。因为中美两国对“一中原则”的认识不同。美国的“一中原则”包括很多要素,例如美国的利益是台湾问题一定要和平解决。中国的“一中原则”的首要诉求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会谈中双方都同意努力改善往届政府所建立的框架,即建立四个新对话机制。可以预计,新对话机制将取代运行多年的中美安全战略机制。双方将通过这四个机制达成具体的成果,并用成果鉴定中美的合作。

通过此次“习特会”,中美关系的新起点已经建立。在新起点上,两国在上述以及更广泛的具体领域上的合作成效将取决于双方在工作层面上如何

实践四个新对话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认为四个高级别对话合作机制,及其运作方式和运作效果,将为我们今后观察和评估中美关系的演变与发展提供很好的切入点。

钟振明(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此次“习特会”的意义有三点:

第一,中美关系趋于稳定。由于特朗普竞选时和就任总统后,在有关中国的政策议题上,包括台海、南海、贸易、朝核等方面发出非常强硬的声音。但后来在许多议题上又恢复到务实和相对温和的态度。前后矛盾的现象给中美关系和未来前景带来很多的不确定性。这次会晤使两国元首有机会进行全面的沟通,并且基本上达成了加强对话、管理分歧的共识。

第二,务实合作得到延续。此次首脑峰会取得的成果,如达成诸多共识、建立四个高级别对话机制、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沟通协调等,确立了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的基本基调,即接触与交往。此前有很多猜测认为中美两国将会敌对或对抗,但此次会晤确立了双方持续务实合作的预期。

第三,工作关系得到巩固。双方首脑之间形成的工作关系往往能够在关键时期扭转紧张的双边关系,之前几次的习奥会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通过此次会晤,特朗普有机会充分了解中美关系,知道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以及中美保持合作的重要性。

当然,我觉得在“习特会”之后,双边关系仍然存在着广泛的挑战。

第一,热点问题矛盾犹存。在经贸、朝核和南海等问题上,中美之间的矛盾将长期存在。任何一方都很难从对方身上得到更实质性的让步。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问题还有可能引发两国关系的再度紧张。

第二,两国关系定位仍不确定。关于两国关系的定位,中方非常重视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提法。但是美方更关注建立具有建设性且重视结果的关系。

第三,特朗普团队存在不确定性。特朗普本人多变的特质,以及他的国家安全幕僚团队成员大多比较强硬。国务院系统人员尚未到齐,未来还有一些变数。

第四,中国周边国家地区的反映和将来的行为还有高度不确定性。比如杜特尔特最新的表态,以及蔡英文当局、安倍政权、变动的韩国政权和朝鲜等,任何一点都可能导致中美两国一时无所适从,中美两国如何管控危机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詹德斌(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朝鲜半岛研究中心主任):“习特会”在朝核议题上的成果有积极与消极两方面:

积极方面有三点。

第一,双方确定了通过加强中美合作和平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能性。蒂勒森在简报中提到了与朝鲜“对话”或“讨论”等词汇,尽管他附带了一句模糊的前提条件,但关键词还是合作与和平。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冲了过去一段时间特朗普不断发出单方面解决朝核问题的强硬态势。

第二,中方同意美方对于朝核问题严重性的判断,同时美方也表达了理解中方在解决朝核问题上的忧虑和困难。这有助于中美之间在朝核问题上进一步的沟通,至少在一定的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相互理解。

第三,中国的双轨方案有望在今后的中美对话平台中得到进一步讨论。特朗普表达了欢迎中国提出任何可以解决朝核问题的想法,其中包括中方提出解决朝核问题的方案。中美在双边对话平台特别是外交安全对话机制上,应该会进一步讨论细节问题。

消极方面有两点。

第一,朝核问题解决方案仍未定。会谈前外界对朝核问题的解决有很高的期待,但结果却没有提出解决朝核问题的具体方案,没有提出中国的“双轨”一词,也没有谈到今后如何处理。中方的简报甚至未涉及朝核问题,

这暴露了中美之间在这该议题上的分歧依然非常严重。美方在简报中仍然不断威胁单方面解决朝核问题的可能性。

第二,未提及“萨德”问题。“习特会”结束后特朗普很快就和韩国代总统黄教安通电话。黄教安非常积极地评价美方在朝核问题和“萨德”问题上的努力。在我们看来,美方在萨德问题上相当坚持,可能意味着韩国今后在“萨德”问题上会更加强硬,韩国国内反对“萨德”的一些政治势力对此也会非常失望。这不利于五月份新上台的韩国政府找到改善中韩关系的突破口。

汪晓风(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习特会”反映出当前特朗普对华政策的三个特点。

第一,成果导向。特朗普对短期内可以见效的话题,以及重要的问题会感兴趣。而对于我们所重视的一些战略性、全球性问题则兴趣不大。

第二,要求互惠。他常用“互惠”一词,认为互惠涉及每个具体领域。

第三,议题简化。相比奥巴马政府,特朗普对议题进行了缩减。比如,建立四个新对话机制,尝试将此前近一百个双边对话机制嵌入其中。这体现了他要简化双边关系中的一些复杂问题,同时也体现了其对奥巴马政府遗产的颠覆。

网络安全议题的成果有两个方面:

一是建立了对话机制——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网络安全议题,特别是规则方面的对话,可能将纳入到外交与安全对话中。但这有可能造成议题的分散化。

二是建立了正向期待。在此次“习特会”进行之前,特朗普曾多次提到中美网络安全议题,但这次,特朗普声称所有复杂的议题都可以解决掉。这说明他期待解决这些问题。

网络安全议题的挑战有五个方面:

一是中美网络安全缺乏互信。美方仍然认为中国是损害美国国家利益的网络攻击的主要来源。在“习特会”之前，蒂勒森也说，尽管中美有意愿合作，但也存在挑战，其中就包含了来自于中国的网络攻击。

二是与贸易相关的网络安全问题。美方要求双方市场对等开放。近年来，我国提升了网络安全级别，提出了网络强国战略，中国对很多美国产品附加了限制。这实际上是一个市场开放的问题，未来与贸易相关的网络安全议题将是一个挑战。

三是对话机制存在不确定性。第一，美方尚未安排相应的人员或部门负责网络安全议题。第二，美方对华稳健派，如其女婿库什纳实际上还受到来自于国内以及国会的压力，因为他的合法性存在疑问。这会对中美两国此后的有效对话与合作产生不确定性。

四是如何将原有的网络议题嵌入到四个新对话机制里。由于特朗普十分重视这项议题，因此我们认为这种嵌入是有机会的。例如特朗普多次提及网络的反恐议题，他特意强调对伊斯兰国恐怖主义的宣传和招募进行网络战。另一个是信息技术开放的问题，包括马云提出的通过网络电子商务发展促进就业。我们可以在上述两方面做出努力。此外，特朗普对虚假信息传播非常重视，这方面我们可以同特朗普分享经验，做一些积极的工作。

五是网络监控或者美国情报部门对我国政府及重要基础设施的攻击和监控。特朗普与情报机构的关系很不好，如果我们抓住机会，对美国提出这个关切，或许可以推动特朗普在这方面做一些工作。

王震(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反恐方面我认为美方对中国有需求,有三点原因:

第一,美国应对威胁离不开中国。特朗普当选后国内有很强的特朗普忧虑症,我认为虽然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反恐合作能够得以延续。因为美国仍然是全球圣战分子攻击的目标。

第二,美国的战略转型和反恐政策转型离不开中国。美国从阿富汗以及中东撤军都离不开中国的合作。

第三,打击“伊斯兰国”需要同中国合作。特朗普竞选时提出要打击“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很可能面临着全球性回流的问题。如果特朗普要兑现其在大选期间的承诺,美国需要同中国及中国周边的伊斯兰国家合作。

总之,经过首脑会谈,各方面都比此前预估的要乐观。

关于具体如何合作,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认识:

第一,从合作内容来看,包括两方面:打击恐怖主义和叙利亚事务。虽然双方在对恐怖主义的定义方面认知不同,例如我们定义的恐怖主义主要是三方面,即武装分子、东伊运和分裂分子,美国不承认。但是从名义上讲,双方都在打击跨国性的圣战分子。

第二,从形式上来看,也有两方面:双边合作和多边合作。

首先是双边合作,最直接的方式是中美的战略对话。在 2014 年第六轮战略与经济对话之后,双方开展了副部级的会谈,因为当时美国在反恐上需要与中国合作。此次会晤又提出了“四大支柱”,其中包括执法合作,目前尚不清楚该合作如何落地。如果由公安部主管,那就是缉凶方面的合作,但目前已有这方面的合作,且已在联合国下属机构开始操作。此前我们的反恐协调机制由外交部主管,但执法合作由哪个部门操作尚不清楚。但总体来看是有希望的,可进一步推进。

其次是多边合作,主要有两方面:

一是在联合国框架内的合作。去年 G20 峰会,中美双方达成共识,共同在联合国 1267 委员会和“基地”组织制裁委员会下合作,涉及东伊运、“基地”组织、“伊斯兰国”以及叙利亚的“解放阵线”等,这是我们与美国共同打击东突暴恐分子的国际法依据。另外,在国际刑警层面,虽然美国基本认可,但是作用有限,因为它无法限制世维会等分裂分子。对我们有利的是,特朗普准备取消或者削减对外国 NGO 的支持。由于世维会的主要资金来

源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NED的预算削减也将削弱世维会活动的能量。但未来的发展还需要进一步观察,因为世维会已明显成为美国和日本牵制我们的筹码。

二是多边框架下的合作,主要有阿富汗问题和叙利亚问题。阿富汗问题方面,按照奥巴马的政策,美国将于2017年底撤军,但目前形势还不明朗。我认为,特朗普不会立即撤军,因为美国已经有效降低伤亡、削减成本。但无论撤军与否,美国在阿富汗问题上都离不开与中国合作。目前的四方和谈机制推进速度缓慢,特朗普会不会强化四方会谈有待观察。叙利亚问题方面,虽然各方名义上是以反恐为目的,但实际上则是地区事务。我认为,如果叙利亚问题未来转入政治谈判,中国的作用就会凸显,因为中国是能够与各方沟通的国家。

于宏源(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所长、研究员):中美关系发展具有以下不确定性:

第一,秩序的不确定性。从中美结构性关系的层面来看,一方面美国依旧是当前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主导,中国对该体系也具有一定的依赖与惯性;另一方面,中国巨大的经济体量又会对该体系的规则和秩序带来一定的改变,特别是中国已经在全面冲击经济方面的主导权。这将会产生许多矛盾。

第二,结果的不确定性。在讨论特朗普对现有机制的影响时,还要注意意图性结果和非意图性结果。不同于其他领导人,特朗普掌控矛盾的方式与我们传统认知的一些领导人不一样,就如同俾斯麦和其继任者带来完全不同的执政结果。双方的意图是好的,但是可能种了西瓜收获芝麻。因为大国之间经常出现非意图性结果。在能源领域,有两件事情和我们之前预想的不一樣:一是美国政府参加了G20能源部长级会议,目前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强调经济利益和清洁能源的关系。二是美国几个著名机构开始起

诉奥巴马清洁能源电力计划的总统令。这两件事情从国内和国外都可能会对美国的能源政策产生一定的影响。

“习特会”没有具体谈到的问题：

第一,美国的能源和气候政策会调整,但大趋势难以撼动。根据声明,美国现有的政策会有调整,特别是在 G20 和波恩会议之后,美国是否会退出《巴黎公约》,这与中国和其他全球治理形势有密切的联系和影响。但是,美国绝大部分州都已奠定了清洁能源计划的基础,绝非一个总统令或者几句话就可以改变。近年来,美国的能效、煤炭市场等都显示出巨大的变化。美国的能效是中国的 3 到 4 倍,能源结构远远优化于我们。

第二,中国的能源市场开放可期。我国的能源电力、天然气、煤炭都较为垄断,但是我们国内的能源市场相对于美国有巨大的量制,如果开放将会有很大的合作空间。

第三,传统能源合作前景广阔。主要是液化天然气(LNG)和煤炭,中国每年天然气的进口接近 20%左右。此外,煤炭的增长速度也非常快,中国占全球煤炭贸易的 1/3。它对于中美之间的能源合作十分有利。

第四,能源基础设施潜力大。近年来,中国、美国、欧洲都在强调微电网和智能电网,它与智能互联网有很多的共性。中国的能源对外投资中,火电占 22%,电网占 17%,因此电网投资是中国最有竞争力的抓手之一。

第五,共同制定能源标准。全球正值一个能源转型革命的时代,再过十到十五年,也许全球能源近半数会是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届时我们将会考虑谁能够制定或者谁能够共同制定天然气的能源标准,如果我们再往后看五年到二十年,电动汽车领域也许是中美可以合作的一个领域。未来二十年双方的能源结构将以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但现在这两个领域还没有标准。

第六,中美能源合作领域广泛。中美从 90 年代开始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合作,如今不能让二十多年的成果成为回忆。未来几年就煤炭、低碳城市、

城市电网等方面有很多具体的项目。这已存在于中美过去二十多年的合作框架中。全球在未来二十年的能源基础设施投资至少要超过 5 万亿美元左右,中美两国在这方面会有巨大的合作面。

朱杰进(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此次会晤取得的主要成果是两国建立了管理中美关系的体制机制。俗话说,小治治事,大治治制。那么,经过这次“习特会”,新老制度之间到底有什么差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蒂勒森在吹风会上指出,中美之间建立了一个新的高层谈判框架,即美中的全面对话机制,下有四个支柱。他强调,美中的全面对话机制是由两国领导人之间进行监督和实施的。原来中美之间非常重要的协调机制是战略与经济对话(S&ED),现在则是四大对话机制(CDM)。比较来看,CDM 与 S&ED 差异主要体现在三方面:

第一,CDM 议题更加广泛。四个对话相对于 S&ED 来说议题更全面。

第二,政治级别更高。CDM 直接由两国元首进行监督,在中方的新闻稿里特别强调,需要两国领导人深思,为未来五十年的中美关系做出政治决断,拿出历史担当。

第三,控制力更加均衡。以执法与网络安全对话为例,中方新闻稿指出中国愿意合作,但美方更加偏向于把执法与网络安全提到更高层次。中方强调,执法和网络安全合作的重点议题应是打击跨国犯罪、反洗钱、网络犯罪、反腐败和追逃追赃等。也就是说,如果一方设置轨道,那另一方就在设置具体的对话议题上体现诉求。双方在整个对话机制中的控制力较之此前更加均衡。

为什么“习特会”能够对中美之间的治理机制实现如此升级?我认为与当前的中美两国就最突出的问题是加强合作有关系

第一,双方对相对收益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现在中美两国不仅关心自己得到多少,还关心对方是不是得到的比自己更多。从制度主义角度出发,

这是理性选择,双方在关注相对收益的同时,更倾向于议题扩大,并做议题交换,即制度主义所说的议题联系战略。

第二,政治级别提高有助于从全局角度下做政治交易。在3月的G20财长会议上,美国尤其反对自由贸易和气候变化等议题,相反,中国从年初开始,习主席在日内瓦和达沃斯高举全球化和气候变化的大旗。可见,双方都非常关心分配的问题,即相对收益的问题。

第三,政治级别提高有助于问题的落实。特朗普十分强调中美合作协议的落实。美方不断强调成果导向,如“百日计划”,希望合作清单早日实现。在此情况下,提高政治级别,让最高领导人直接监督,能够更快推动问题的落实。

第四,实力对比更均衡。中美之间的实力在接近,使对话机制更加均衡,显示出重要性。

总之,“习特会”在中美之间的治理机制方面取得了引领性、开创性的成果。

吴心伯:最后,我谈几点个人的看法作为总结。

第一,两国领导人和两国工作团队之间比较顺利地建立了工作关系,特别是习主席和特朗普两位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

之前外界担心,性格迥异的两位领导人能否谈得来?我认为习主席与特朗普是谈得来的,因为两个人都比较坦率、接地气。习主席与奥巴马沟通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因为风格不一样。奥巴马比较敏感,心理也比较微妙。特朗普则直来直往,与习主席的风格类似。所以,双方的评论都强调两位领导人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这种提法在此前的官方表态中很少见。鉴于特朗普直爽的性格,与他建立私人关系能够发挥作用。而且他的执政方式如同大老板办公司,其团队强调的是家族、小圈子和忠诚度,不建立个人关系无法开展工作。

另外，两个团队之间建立关系也很重要。两个团队在“习特会”之前已经开始工作。中方的经济事务由汪洋副总理领衔，外交和安全事务则是杨洁篪国务委员主持。我们应把“习特会”与两个工作团队的会晤结合起来评估。双方团队的前期工作已经有了初步成果，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表示满意的原因。

此前美方担心中国方面比美方更专业。例如，杨洁篪等人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美方团队成员却基本都是经商的。但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并不关心美方是否专业，而是关心其对华的基本态度，是鹰派还是务实派。在经贸、国防等方面的人士安排上可看出，美方内部的务实派、温和派、对华理性派在与鹰派的较量中略胜一筹。这种主持对华关系的团队人员搭配，到目前为止是理想的。

第二，“习特会”为两国关系下一步发展构建出了一个积极的基调和建设性的路线图。

积极的基调主要指双边关系的定性。此前两国领导人的会晤都要为双边关系的发展定性。奥巴马执政时期同习主席会晤，其定性是积极和平的全面伙伴关系。此次中方考虑当前中美是战略性的合作关系还是务实的合作伙伴关系。美方则认为双方应是以建设性的结果为导向。因此，最后双方要形成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表述比较困难。从会晤的互动方式以及会后双方的公开表述看，我认为积极的基调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双方都指出，要以相互尊重的方式处理分歧，实质是经贸，这也是美方最强调的。如何勾画建设性的路线图？一是在多个领域扩大合作，二是谨慎处理分歧。

第三，重新确立处理双方关系的机制性保障——四大对话机制。

特朗普执政伊始，美方质疑此前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效果，不同意延续。最后美方认为需要继续此类对话，因为如果没有相关机制，出现问题时会没有抓手。除了经贸、外交安全、执法与网络以外，我们最担心的是社会和人文教育，这是近年来我们人文外交的一个重点，此前美方在这方面并不

感兴趣,但最后还是接受了中方的建议。

第四,具体问题上双方有一些正面的互动。

经贸问题上,美方高层积极寻求解决之道。他们认为,一是美方正在和中方进行充分的沟通,向中方表示其关切,二是美方正在加强内部协调。所谓加强内部的协调,就是协调纳瓦罗和罗斯提出的强硬政策。

朝核问题上,双方确认了两点,一是强调在联合国框架下执行安理会决议。二是以和平方式解决。上述两点基本符合中方立场。

两军关系问题上,奥巴马执政后期美方已经在释放信号,即近年来美国与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冲突是由奥巴马政府的错误政策造成,美方不应和中国继续保持这种积极、高调的关系。美国的一些智库也主张要减少甚至冻结与中国的军事交往关系。但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也参加了此次会晤,美方还提出增加联合参谋部的机制,这说明两军关系得以保持。习主席关于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最重要的方面就是两军关系。

最后,王毅外长介绍了双方可以共同合作的一些内容,比如防扩散、打击全球犯罪等。此前的中美元首会晤通常会讲双方要加强在 APEC、G20、东亚峰会、气候问题上的合作等,但这次没有。这也符合特朗普基本的执政理念,他对多边经贸国际机制并不感兴趣。美国财长也指出,美国认为多边机制对于解决不公平的贸易和美国的对外贸易没有起到作用,因而期望于转向双边谈判。这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性的调整。

如果对本次峰会做一个定义,那么可以说:特朗普政府与中方实现了顺利的对接,中美关系实现了从奥巴马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的平稳过渡。此次“习特会”是我们新时期对美外交一次成功的开局。

从特朗普本人以及他的团队对华基本的理念和倾向来看,至少有几个方面对中美关系发展比较有利:

第一,特朗普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较少,不过多纠结于人权问题。

第二,重视经济和安全关系。这两方面都是以往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

现在则得到妥善处理。

第三,特朗普团队的主导核心圈是务实、交易型,讲求对等互惠,为中美互动提供了较大的空间。

第四,特朗普本人对中国有好感。他曾多次表示钦佩中国发展取得的成就,对习主席个人也非常钦佩。习主席访美期间,特朗普发言人称美国要与中国一起干大事,这是特朗普的原话,特朗普对中美关系有较高的期待。奥巴马政府上台时恰逢金融危机,危机缓解后其对华态度就发生转变,但特朗普所关注的中美经贸问题不是短期内能解决的。

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我认为今年年内我们要处理好三个问题:

第一,四大对话机制要顺利展开。两国需要把可能的问题都纳入到各自的讨论中,让两国的领导人来处理。

第二,在经贸问题和朝核问题上,要有阶段性进展。“百日计划”的核心是扩大美国对华出口,减少双边贸易不平等。朝核问题上,在一定的期限内主要表现为中国要加强执行安理会决议的力度。

第三,确保年内特朗普访华取得成功,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处理对华关系的意愿。

(以上发言根据记录稿整理,未经本人审阅,如有误差以本人发言为准)

联系方式：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 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电 话：86-21-53068153

传 真：86-21-53067106

电子邮件：siassias2015@163.com
